

场经济,由于其发展与演变,变成了一种不尽合拍的全球集体舞。维持西方的主导是不公正的也不合时宜,指望公司、企业或民族国家自律可能是一种奢望。在市场经济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新时代,世界同样需要建立新的原则性契约。

大危机会催生大调整。当然,一种秩序的转变甚至是一种机制的建立,过程会是漫长的,它绝不是一个简单推倒重来的过程。在既有机制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之前,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对一种新秩序的期待与建构不应畏缩,世界需要加快寻求共识与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实现,将成为此

次危机可能孕育的重大历史遗产。

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同样是利空,危机时代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蕴含着大机遇。中国的崛起在于顺应全球化,主动融入世界,而不是在试图颠覆既有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中国总有一天会崛起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国,如果届时承继的仍是一个差不多百年前建立的旧世界体制的外壳,当可以想象否?在世界呼唤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更时,中国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逢其时,当应有为。○

##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赵晓春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自 2008 年爆发以来已迅速波及全球,并由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无一幸免,“金砖四国”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击。经济学家和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这是自 1929-1933 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经合组织(OECD)将这场危机定性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覆盖面最广”的“一轮衰退”。鉴于 1929-1933 年大危机在促成二战爆发和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有理由关注这场给予世界经济政治以巨大冲击的危机将对国际体系的演变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历史角度看,国际体系变迁的根本动因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主要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国际体系的转型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的。在认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区分危机的方法,依其对国际体系变迁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直接或重大影响的一次性危机,一类是尚不足以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的可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机。前者最具代表性的即是 1929-1933 年

大危机。正是这场大危机,直接引发了西方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激化了凡尔赛体系的内在矛盾,催生了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加速了二战爆发和国际体系转型。此外,导致两极体系崩溃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苏联解体,亦可视为一场一次性危机,即苏联自身深刻的经济危机直接诱发了政治、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致使整个苏联陷入难以平抑的总危机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从后一类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仅大型危机就有 20 次左右,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影随形。但这些危机在通常情况下,并未引起国际体系的转型,而是在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的循环往复中显示出周期性特点。周期性危机的结果是导致体系恢复平衡,但这种平衡又不是简单地回到危机前状态。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周期性危机都以渐进、累积方式推动着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的发展,改变着体系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对国际体系产生深刻的趋势性影响。这也是我们何以必须高度关注周期性危机对于国际体系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考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场危机究竟是一次性危机还是周期性危机?根据当前金融危机实际产生的影

响和发展趋势分析,就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而言,尚不及 1929-1933 年大危机那样严重;就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它既不具有像 1929-1933 年大危机加速二战爆发那样深刻的矛盾基础和条件,也不存在体系中某一主要大国因危机而面临国家解体的现实可能。再从危机持续的时间看,综合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这场危机将在 2009 年或 2010 年结束,即便是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危机将持续 5 年甚至更长,但大体上仍属于未能打破周期节律的正常波动。因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场不足以导致国际体系发生根本转型的周期性危机。

但是,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二战以来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其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冲击必定会是深刻而重大的。事实上,尽管危机目前尚在持续之中,但这种影响和冲击已经初露端倪,并反映在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层次、体系结构、制度规则等各个方面。

从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看,新兴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预示着国际体系在单位层次上正在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长期执掌全球经济治理大权的 8 国集团不得不敞开大门,包括众多新兴经济体在内的 20 国集团因其广泛的代表性而走到了历史前台。新兴经济体要确立其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还有漫长的道路,但这些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金融危机这一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和象征意义,可以说不下于二次大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的大批涌现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砖四国”进一步加强了合作与协调。继 2008 年 5 月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第一次以“金砖四国”名义举行会议之后,2009 年 3 月 14 日“金砖四国”财长又在英国发布联合公报,表示将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 4 月 2 日举行的 G20 伦敦峰会上,“金砖四国”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立场,携手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显示出“金砖四国”作为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看,金融危机不会对

“一超多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但多极化的发展有可能进一步加速。本次危机给予美国经济金融实力较沉重的打击,经合组织预计 2009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4.0%,2010 年也不会出现任何增长。但另一方面,支撑美国“一超”地位的其他实力要素,如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等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加之美国经济给世界其他经济体造成的一损俱损同步效应有不断加大趋势,美国的“一超”地位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动摇。与美国的情况不同,金融危机将加速“多强”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这是因为“多强”之间的经济差距相对较小,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欧元区和日本遭受打击最为沉重,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幅放缓的情况下仍可保持一定的增速。据经合组织预测,2009 年日本 GDP 增长 -6.6%,为发达国家中最差;欧元区国家增长率为 -4.1%;2010 年经合组织 30 个成员国增长率仍将为 -0.1%。另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 2009 年的增长率将为 7.0%,2010 年为 8.0%;印度 2009 年的增长率为 5.0%,2010 年达到 6.5%。正是基于此,已有预测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将继 2007 年超过德国之后,在 2009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也撰文指出,中国已做好了挑战日本的准备,印、俄、巴西 3 国将在未来数年赶上加拿大和意大利。还应当看到的是,虽然美国的“一超”地位在短时期内难以撼动,但在美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经济的继续增长和实力的相对提升,无疑将会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利用此次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中国缩短赶超美国的时间是可以期待的。近年来,高盛公司研究部门多次调整预测,将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从本世纪 40 年代提前至 20 年代的某个时间,亦反映了这样一种可能。

从国际体系的制度层面看,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由 20 国集团召开的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已拉开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在金融监管领域,伦敦峰会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金融稳定论坛,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测。峰会决定对所有具有系统

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并首次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畴。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权和话语权问题上,伦敦峰会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实施改革,赋予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以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脑和高级领导层的产生也要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在国际储备货币问题上,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也将在2009年9月的G20纽约峰会上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G20作为一个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设立的应急磋商机制,反

映了全球力量对比变化的新现实,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挥自身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如果假以时日,G20能够实现常态化和机制化,并在应对重大危机中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则其在制度层面将对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金融危机尚在持续之中,诸多不确定因素使我们还无法对危机之于国际体系的影响程度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估,但它无疑已显示出推动国际体系朝着力量均衡、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且这种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

宫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教授)

战略观察的要义是要有前瞻性,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到事物的微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目前,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迅速席卷全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不能不对当今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得很对:“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而战略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在“随后的混乱和喧嚣中”,通过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透过纷繁的表面和迷雾,来“认清已被改变的战略版图”,并由此确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美国、欧洲、日本相继遭受重创,2009年都进入了负增长的困难时期,实力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国经济也受到冲击,但毕竟没有处在震源的位置,仍有希望实现增长8%的目标,并将率先走出低谷。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战略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必然影响到国际秩序的变革。

从G7到G8再到G8+5一直到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化的轨迹和发展趋向。曾几何时,以美国为核心的G7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但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集团的局限性和新兴大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政策协调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认识。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在伦敦G20峰会前表示,G7已不再是世界经济问题的主导者,G20的有效性和机构体制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也意识到:“如今,没有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你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危机,因此G8已经过时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也在呼唤新兴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但这不会一蹴而就,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G20峰会上,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谋求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更多权利。当然,希望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立刻就发生根本改变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以美国为核心的G7主宰世界经济事务已经难以为继,变革时代已经来临。发达国家为了渡过难关,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情况,开始接受和正视新兴大国正在崛起这一现实。

谈到国际战略力量的消长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不能不提到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变化。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曾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世界。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